



暗夜星火 迎接黎明

张
悦

太原沦陷时期，广大太原工人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抗日斗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积极贡献。

1937年11月8日，太原会战的硝烟还未散尽，日本侵略者即开始对太原各厂矿进行疯狂掠夺与破坏。一方面将相对先进的机器设备拆运至日本本土及伪满洲国境内，另一方面利用山西煤铁资源进行掠夺式生产。例如，育才炼钢机器厂等三厂被改称为“军管理第十工场”，400台各式设备遭到日军掠夺和拆运；太原兵工厂被改称为“山西军工作所”，购自欧美的先进设备被大量拆运，甚至许多原材料也被劫掠一空。1938年，在经过多次掠夺后，日方开始逐步恢复各厂矿生产。1942年后，日本方面打着“日华合办”的旗号，统一管理太原乃至山西的厂矿企业。

日伪势力控制下的太原各厂矿呈现出明显的殖民色彩，各部管理人员多由日本人充任，生产技术也被日方严密封控。中国工人不但只能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体力劳动，而且惨遭压迫。与此同时，日伪势力对太原工人实行奴化政策，日伪管理者通过日本工头和汉奸把头控制中国工人，不但引诱他们吸毒和赌博，还动辄打骂体罚，进行奴化教育。

日伪势力的残酷剥削和掠夺将广大工人推到了死亡线的边缘。工人们为了求生存，同敌人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斗争。太原沦陷之初，工人们的反抗斗争多以消极怠工和毁坏生产工具、设法制造生产事故等方式为主。例如，太原电化厂盐酸组工人故意不按操作规程办事，利用夜班时间烧坏了盐酸石英设备一组，造成停产修理的局面；太原纺织厂女工一方面消极怠工，另一方面将杂质甚至垃圾等混入纺织原材料中，严重影响了该厂产品的质量；太原兵工厂的工人在厂区附近的铁路上放置石头和铁块，造成敌人运送军用物资的火车出轨。

1940年前后，太行、晋绥等根据地向太原派出地下工作队员，并积极联络各厂进步工人。与此同时，八路军的敌后抗战取得了一系列战果，也激发了太原工人的斗志。这个时期工人的抗日斗争开始转向新阶段，除消极抵抗外，涂写抗日标语、罢工斗争和破坏活动也成为工人抗日运动的重要内容。例如，晋华卷烟厂的工人因不满日伪势力的剥削和压迫，放火焚烧了该厂五号烟叶库，烈火整整燃烧了5个多小时，烧掉了烟叶5万多公斤；太原电化厂进步工人在供水塔和办公室附近墙壁上用粉笔书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者赶出去”等宣传标语，造成日伪势力的高度紧张；西北炼钢厂地下工作者通过串联，组织近百名工人罢工，使高炉车间完全停产，迫使日方为中国工人提高待遇；晋生染厂的工人采取了联合行动，夜打伪厂警“黑狗子”班长，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压迫，维护工人的切身利益。西北机床厂、西北机车厂和山西煤矿等厂矿的工人，也开展了多次罢工斗争，西山各煤矿甚至一度陷入停产。

1944年底至1945年初，国际反法西斯斗争进入新阶段，日本侵略者也已成为强弩之末。潜伏在太原各厂矿的地下党员紧密团结进步工人，地下活动和反抗斗争空前活跃。他们发挥自身优势，有的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扩大党的影响，争取职工和群众的支持；有的机智勇敢地突破敌人“强化治安”，开辟了地下运输线，把大量的硫磺、弹药、布匹等重要物资运至根据地；有的深入龙潭虎穴，搜集军事情报，瓦解伪军伪警，甚至进行了武装暴动。

1945年初，西北炼钢厂工人在地下党领导下，把经过特殊处理的电线放入重油池内，引起大火，多个生产车间、办公室被烧毁，损失惨重，随后日本控制下的该厂陷入停工状态。西北水泥厂的进步工人将碎石车间、生料仓等厂房和机器设备放火烧毁，抗战胜利前夕，水泥厂几近停工。地下党组织在太原西山硫磺矿工、正太铁路工人和东山挑夫的配合下，通过郝庄、东山朝阳洞至寿阳、平定的秘密交通线向太行和晋察冀等根据地运送了大量硫磺，为根据地兵工厂生产炸药提供了关键原料。

抗战胜利前夕，潜伏在西山矿区的晋绥八分区地下党员在进步矿工的帮助下，查明了日伪势力在西山矿区的驻军情况和武器配备情况，并争取了部分伪军警。收到情报的晋绥八分区一支队集结了9个连的兵力，以地下党组织、进步矿工及反伪军警为内应，组织了夜袭西山矿区的战斗。在我方人员的里应外合下，矿区中心白家庄及其附近的敌碉堡纷纷被八路军攻克，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工人还策动了红沟据点伪军的投诚。夜袭太原西山战斗，是太原地区抗日武装与地下党组织、进步工人群众里应外合取得胜利的典型，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贡献。



沦陷时期的西北炼钢厂，时称“太原铁厂”（作者供图）

纯阳宫里话纯阳

曹嘉成



【太原纯阳宫】

太原纯阳宫名列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位于太原市五一广场西北隅。据《山西历史地名录》记载，太原纯阳宫创建于宋朝末年，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进行了大规模扩建，清嘉庆年间又在后院窑洞顶上筑魏阁（玉皇阁），始具现有规模，现存建筑主要为明、清时期遗构。太原纯阳宫建筑风格与传统北方官式建筑布局迥异，为南方园林式建筑风格，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又一个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

在太原民众的口耳相传中，吕洞宾不仅能够帮助太原百姓除去淹没汾河两岸、让民众叫苦不迭的水怪，也能巧妙化解玉帝所降下的瘟疫，甚至还能在地方官员献礼时出谋划策，用漆器与松树搭配而成的“一统万年青”赢得了皇帝的赏识。也许正是因为吕洞宾种种惩恶扬善的“显灵”之举，诸如理发等行业的商人，以及小贩也常将吕洞宾作为行业神进行供奉。

今天的太原纯阳宫，不仅是有着常阳天尊像、涅槃变相碑等众多国宝的宝藏景点之一，而且是山西省古建筑博物馆所在地。各项主题展出与手机应用等新技术的加持，让这座古老建筑又焕发出新的活力。



(8)

吕洞宾号纯阳，在民间传说中，哪里有这位“纯阳子”，自然是少不了一番行侠仗义、消灾解难、惩恶扬善的传奇故事。祭祀吕洞宾的祠庙常被人们称为“纯阳宫”。在山西的一众祭祀吕洞宾的祠庙中最为有名的是，当属“中宫”太原纯阳宫，“北宫”大同纯阳宫、“南宫”芮城永乐宫这三大纯阳宫，说起建筑形式最为特别的，当数太原的纯阳宫。

这座始建于宋代的纯阳宫，经过明清时期的不断修葺，因而带有明显的明清建筑风格。刚进入院落，就能看到在高大的写有“吕天仙祠”的牌匾后面券拱门中央上方，据传为钟离权以楷书所写的“道德之门”四个大字，两侧较小的牌匾上，则分别由“河上仙翁”“山中宰相”陶弘景以草书写成的“龙飞”“虎伏”。正门的两侧，刻有一副“道合昊天，上仙班第一；祠开普地，下洞宇无双”的楹联。而这对“太白山人”所题的楹联与“诗仙”李太白有着不小的关系。

传说中吕洞宾被宋徽宗封为“妙通真人”时，恰逢太原纯阳宫建成。吕洞宾便与钟离权等几名仙人进入纯阳宫中欣赏美景、饮酒作乐。面对这些造型别致、独具匠心的建筑，几名仙人不由得接连啧啧称奇，纷纷在拱门上献上自己的墨宝。驾鹤而来的李白虽姗姗来迟，但楹联的书写又哪能难倒这位鼎鼎大名的“诗仙”，他略加思索便完成书写，加入到畅饮美酒的队伍当中。

传说故事虽多了几分神话色彩，但从故事中描绘的“八角重檐亭”“九窑十八洞”等明清时期建筑来看，故

事的创作时间并不久远。而在前人们的艺术加工中，吕洞宾与清新飘逸的“诗仙”李太白两人的形象竟神奇地重合到了一起。在清光绪版《山西通志》对于太原纯阳宫的记述中，也有着李白的身影：“太原府纯阳宫在贡院东天衢，明万历年朱新场朱邦祚建。相传规划皆仙乩布置。内八卦楼，降笔楼。亭洞幽曲，对额皆乩笔。题碑二，一钟离权乩笔，一李太白乩笔。”李白形象的出现，究竟是前人的无心之举，还是有意为之？

相比于李白，吕洞宾的生平无疑少了几分洒脱。吕洞宾原姓吕，名岩，为山西、陕西一带生人。在唐宝历元年（825）高中进士（一说为屡试不第）后，吕洞宾一心向道，最终拜钟离权为师，并从此散尽家财，专注修道。李裕民先生在《吕洞宾考辨》中认为，相比于唐代，现实中的吕洞宾是五代至宋时期士人的可能性相对更大一些。

吕洞宾“显灵”的事迹在北宋时期就已初见端倪，宋元时期，全真教的推波助澜，以及南戏、杂剧等戏剧艺术形式的成熟，加快了吕洞宾传说在民众当中的传播，出现了关于吕洞宾事迹的“说话”。在马致远等一批杂剧创作者们的笔下，《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吕洞宾三度城南柳》，以及后世《吕洞宾三戏白牡丹》等杂剧竞相出现，吕洞宾飘逸不失文雅，喜好云游四方、行侠仗义又神通广大的“神仙”形象就此丰满。明清时期，即使全真教不再像元代那样繁盛，但吕洞宾的相关故事却随着宗教和类似于太原“道情”等形式的戏曲的传播逐渐走入了百姓生活当中，并充分与百姓生活相融合，诞生出一个

晋阳牺汤 千古寻味

杨润德

王惠林

晋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皇家祭祀园林，不仅有庄严肃穆的建筑、参天的古木，更有一道独特的美食——牺汤，它宛如一首古韵悠悠的诗篇，用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与变迁。晋阳牺汤的历史脉络深深植根于中国古代祭祀文化与民族融合的进程中，其发展演变不仅是一部饮食文化史，更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活例证。

牺汤源流演变

周代起源：祭祀礼制的物化载体。牺汤的起源可追溯至西周时期的宗庙祭祀，祭祀在当时是国家最为重要的活动之一。《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牲，戎有受脢，神之大节也。”《说文解字》释，“牺”为“宗庙之牲”，西周贵族以全羊为祭品，祭祀后将熟肉连汤分赐族人，形成早期“分胙”传统。“牺牲祭祖”的习俗在《周礼》《礼记》中均有印证，如《周礼·天官冢宰第一》载“庖人”职掌“祭祀之好羞”，反映出周代对祭祀用牲的严格規制和礼仪。

秦汉延续：从宫廷到民间的过渡。西汉初年，汉文帝刘恒以代王身份驻于晋阳（今太原），推行“禁宰耕牛”政策，促使羊肉成为主要肉食来源，牺汤随之普及。这一时期，牺汤开始从贵族走向民间，成为地方节庆的重要饮食符号。

北朝融合：游牧文化的深度渗透。北齐时期，鲜卑、羯等游牧民族涌入别都晋阳，带来大量羊群与游牧饮食技艺。考古发现，北齐贵族墓葬中有大量羊骨遗存，佐证了羊肉在当地饮食中的地位。此时，牺汤的制作融入游牧民族的炖煮技法，形成“全羊入锅、清汤慢熬”的独特工艺。

唐宋定型：礼制与民俗的交织。唐代《通典》记载，晋阳地区“岁时祭祀，必用全羊”；宋代《东京梦华录》亦提及太原“伏日荐新，以羊为牲”。北宋天圣年间，晋祠圣母殿重修后，宋仁宗之母刘娥（晋阳人）推动晋祠祭祀规格提升、规模扩大，进一步强化了牺汤与民间信仰的关联，牺汤成为庙会期间的标志性饮食。

明清成熟：地方志中的民俗记录。明嘉靖《太原县志》载：“六月六日，各村社祭，煮全羊分食，名曰牺汤。”清道光《阳曲县志》亦记：“伏日饮羊汤，谓之‘以热攻热’，可祛暑湿。”此时，牺汤不仅是祭祀食品，更成为夏季养生佳品，形成“六月牺汤赛人参”的民谚。

文化融合嬗变

牺汤的功能，经过了从礼制祭品到民俗符号的转型。牺汤最初服务于宗庙祭祀，周代“裸露告神”仪式与牺汤制作中的“醋化羊血”工艺一脉相承。“难老儿女庆河会”是围绕晋祠圣母殿展开的水神祭祀与民俗盛会，而牺汤则是这一活动中诞生、并成为其文化符号的饮食载体。“庆河会”的本源是祭祀水神（水母柳春英、圣母邑姜相关的水神信仰），祈求晋水长流、泉源不竭。古代祭祀中，“牺牲”（牛、羊、豕等纯色牲畜）是核心祭品，而“牺汤”最初正是用祭祀后的牺牲（尤其是羊肉，因羊在北方祭祀中常见）熬制的汤品——将牺牲煮烂后分食，既符合“祭祀后与神共享祭品”的古老传统（“神飨其气，人食其味”），也通过饮食完成“人神沟通”的仪式闭环。因此，牺汤从诞生之初就是“庆河会”祭祀仪式的延伸，是“牺牲”祭品的“食用化”形态。

从宗庙祭祀向民俗文化的转型，牺汤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先秦至明清：祭祀仪式中的“牺牲余韵”。这一时

期“庆河会”以祭祀为核心，仪式严格遵循“太牢”“少牢”的礼制，牺汤在祭祀后由参与仪式的贵族或长者分食，平民较少参与，其功能是“承续牺牲的神圣性”，体现“神惠下及”的逻辑。

清末至20世纪末：民俗化转型中的“共享饮食”。随着礼制松弛与民间社会活跃，“庆河会”逐渐演变为集祭祀、娱乐、商贸于一体的民俗节日。此时，牺汤的受众从仪式参与者扩展到所有赶会民众，晋祠周边村民会提前准备食材，在泉边或祠堂旁支起大锅熬汤，参与者按需取用。这一阶段，牺汤的神圣性减弱，世俗性增强，而“庆河会”也因牺汤的共享性成为凝聚村落关系的纽带。无论贵贱长幼，都能分到一碗热汤，强化了“同饮一泉、同享一汤”的社群归属感，“喝牺汤、赶河会”成为民俗活动的标志性符号和周边村民共同的生活记忆。

21世纪以来：文化IP化中的“传统新生”。随着晋祠获评5A级国家景区和国家一类博物馆，尤其是晋祠复流，“难老儿女庆河会”“晋祠庙会”等呈现出“传统内核+现代表达”特征。“庆河会”保留了祭祀水神、集体祈福的核心环节，新增了非遗展演、民俗体验等内容，成为展示晋祠文化的窗口。牺汤则从赶会时的临时饮食发展为标准化的地方美食，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从“祭祀牺牲”到“共享汤品”的演变，既承载着古人对自然的敬畏，也延续着当地人对家园的情感联结。

明清以降，牺汤成为婚丧嫁娶、节庆集会的必备饮食。如晋源地区腊月婚庆和正月待客时，“喝牺汤”仪式往往比正餐更受重视，宾客“宁误一酒席，不误一牺汤”。受中医“冬病夏治”理论影响，牺汤在伏天饮用以“补中益气”，其食疗价值被《政和本草》《饮膳正要》等典籍记载。

牺汤的制作工艺，经过了从粗放炖煮到精细烹饪的革新。

北魏《齐民要术》强调，“羊须羯者，肉嫩无膻”，这一标准沿用至今。晋祠牺汤坚持选用1岁至1.5岁的绵羊、羯羊，确保肉质肥瘦均衡。唐代《食疗本草》记载“羊骨煮汤，去滓取清”，与现代牺汤“宁加一片肉，不加半勺汤”的原则相符。熬汤时需用花椒木柴慢火慢炖，使骨骼的精髓充分释放。宋代《山家清供》提到“以醋解膻”，牺汤所用羊血中大量使用山西老陈醋，既杀菌去腥，又调和阴阳，暗合《黄帝内经》“酸入肝，辛入肺”的养生理念。

从地方小吃到文化名片

小店牺汤已入选山西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晋祠牺汤已入选太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牺汤制作技艺涵盖选羊、宰杀、熬汤、调味等12道工序，将传统工艺与现代食品技术结合，实现守正创新，活化传承。自2019年起，晋源区每年举办“牺汤文化节”，通过“全羊宴展示”“牺汤技艺大赛”等活动，吸引游客体验。

晋阳牺汤的历史轨迹，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微观缩影。随着历史的演进，时代的变迁，晋阳牺汤逐渐从庙堂走向民间，由祭祀仪式变为民间祭祀求雨的一种形式，继而成为民间美食。从西周礼制中的“宗庙之牲”，到现代餐桌上的养生佳品，它始终承载着祭祀文化、民族融合与地域智慧，是太原人的味觉记忆和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文化纽带，承载着人们对祖先的敬仰感恩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唐风晋韵绣太原一张独特的文化名片。

一城春色富河东，
万古中州悉听从。
地贵自然芝草出，
天高长是瑞云封。
堤边翠带千株柳，
溪上青螺数十峰。
海晏河清无个事，
画楼朝夕几声钟。

——小仓月
《太原城》（之二）

金（元）时期的僧人小仓月，以诗歌咏太原城，清新而脱俗，雅致又出尘。

小仓月，生平无考，元僧（有的说是金僧）。明嘉靖《太原县志》注为“太原僧”。生卒时间、供于何寺，均无记录。其有19首诗存世，明白如话，清新如风。读之，如沐春风，如饮甘泉。

《太原城》（之二）一作，起笔高古，文化意蕴春意盎然，历史鼓点深邃点穴，将太原城的生态文化地位“一城春色富河东”和历史文化价值“万古中州悉听从”跃然纸上，高度凝练，形象生动，大气磅礴。一笔大写意，道尽了太原一座城和一条河在华夏文明历史进程中不可撼动的文明贡献和历史地位。

从点赞历史到讴歌自然，小仓月眼里的太原城，“地贵自然芝草出，天高长是瑞云封”，以灵芝辈出和瑞云常驻，高度概括太原两山夹一水，一年有四季，物华而天宝，地杰而人灵，自然而然宜居的特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太原城在金元以前的历史风云中，走出了多少帝王将相和书写历史的英雄豪杰，小仓月以“灵芝”和“瑞云”点题，暗喻太原上风上水，孕育豪杰，荫及苍生。

袅袅炊烟千家诗，星星闪烁万家灯。“堤边翠带千株柳，溪上青螺数峰”，小仓月漫步金元太原柳溪，沿河数柳，看千帆过境，叹画廊映水，诗意盎然，悠然自得，闹中取静，默默享受纷纷扰扰历史间隙的太平人间烟火，甚是自觉、自醒、自悟。

小仓月，一个历史难考的金元和尚，一个置身俗世之外的行走僧人，流连于太原的柳溪之岸，徜徉于晋溪之畔，祈祷“海晏河清无个事，画楼朝夕几声钟”，期盼天下太平，祈望画楼钟声。其人之悟，其诗之蕴，其志之味，几人能及？



诗韵锦绣太原

(42)